

政府引导、产业融合与内生发展： 宁夏红川村“政企农协同模式”研究

李小云*

【摘要】本文聚焦宁夏红寺堡区红川村这一案例，系统分析了在产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困难、市场发育不足的环境下，依托“政府规划引导、项目带动整合、企业运营赋能、农民参与受益”的协同机制，探索出一条具有西部特色的农村产业融合与就地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桥梁与催化作用，通过科学识别本地资源禀赋、科学确立和培育主导产业、统筹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精准引进市场主体，并构建了政府、市场主体与村集体三方权责清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制度化协同机制，实现了“村集体增收、群众就业与产业可持续发展”三者间的良性循环。在城乡互动下农业转型的经典理论视野下，红川村这一实践形成了“政企农协同模式”，实现了外生引导与内生激活的有机结合，使产业在纵向链条与空间两个方面实现融合。“政企农协同模式”还表现出“产业统筹型经营”治理特征，为理解政府角色、市场嵌入与乡村内生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同类地区依托制度优势推动乡村振兴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红川村；产业规划；设施农业；生态移民；融合

有学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业发展究竟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转型的必要

* 李小云，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经济学副教授，E-mail: hpulxy@163.com。

引文格式：李小云. 2026. 政府引导、产业融合与内生发展：宁夏红川村“政企农协同模式”研究[J]. 政治经济学季刊, 5(2): 136-168.

Cite this article: Li X Y. 2026. Government guidanc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 study of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Farmer Collaborative Model” in Hongchuan village, Ningxia[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5(2): 136-168. (in Chinese)

条件,还是一个可以被绕过的过程(Tsakok and Gardner,2007)。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极端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现实和发展的要求。在解释经济增长加速时,最引人注意的因素是技术和大规模投资。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无法吸引资本及相应的技术。进而,用什么样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①?这种解释包含着对于农村经济增长背后逻辑和机制的解析。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如何通过政府规划与项目制开启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新引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协调,才能合理配置资源?宁夏红川村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典型案例,在当地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为回答这一理论问题提供了一种增长模式和实践路径。

红川村,位于中国西部省份宁夏中部地带,隶属于吴忠市,在银川市之南,距离两地分别为100千米、160千米。红川村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地貌区,但村内地势平坦,海拔在1600米以下,村庄位于罗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西麓,气候干旱,光照强,水资源短缺,地表水贫乏。红川村距离主要交通要道远,远离中心大城市。人均耕地数量为1~2亩,土壤无污染,其中,100%的土地属于旱地改水地(现在全为高效节水灌溉)。红川村发展历史不长,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的内生驱动力不足。红川村在气候、土壤资源方面的先天性优势并非独有,且劣势也十分明显。

红川村是宁夏红寺堡区“十二五”生态移民村,安置来自宁夏原州区、同心县的移民。近十年来,通过地方政府的产业振兴行动,红川村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9396元,是2014年搬迁之初的四倍,2021—202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1100元、13340元、16000元、16800元、17600元,年均增长率为12.46%。这种收入增长速度放眼整个宁夏都是不多见的。红川村先后实施了多个产业项目,建设扶贫车间^②,并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最终实现设施农业与项目、扶贫车间的有效结合,围绕主导产业招商,让产业项目匹配主导产业。

放眼西部地区,像红川村这样的行政村还有不少。红川村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似乎都不足以产生这样的收入增长势头。如果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带动和农民的自主探索,为何红川村能获得比其他村经济增长更快的相对优势?政府与企业达成了什么样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形式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需要进一步研究欠发达国家如何发展,如何利用好“发展的要素”(樊纲,2019)。以往的研究更多从宏观层面讨论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而对一个行政村来说,如何识别并发挥自身的比

^① 参见孟捷:《用什么样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CPEER公众号,2020年7月12日, https://mp.weixin.qq.com/s/CqIT_FDOXN2mVsOdBpCR0w。

^② 截至2024年6月,宁夏就业扶贫车间达到412家,分布在22个县(区)的305个村(园区)内。

较优势,则是一大现实挑战。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这些行政村的比较优势应如何被激发出来,从而成为驱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

作为一篇现象驱动型的探索性案例研究,本文的研究缘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源于作者 2021 年在红川村的驻村工作经历,持续关注当地产业发展情况,并对红川村的所有脱贫户、种养殖大户进行走访,了解其收入来源、家庭情况。此外,作者还与当地的村干部、村民代表、乡干部、区干部、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红川村自 2014 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和具体产业发展实践。换言之,本文研究数据是通过调查研究和参与式观察所得。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揭示红川村发展中制度设计的关键。二是在当前项目进村的广泛实践中,农村经济增长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遭遇了一些失败。红川村的案例能为那些具有相似资源禀赋结构的其他西部脱贫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红川村作为宁夏百万移民工程中一个浓缩了共性的典型样本,是一个在极端困境下依靠系统性制度创新和内生动力实现逆袭的案例。红川村面临着极严峻的资源匮乏和产业基础薄弱问题,村民来自宁夏南部山区 18 个乡镇、140 多个行政村,迁入时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2300 元,在红寺堡区垫底,属于负重前行的典型。经过多年发展,红川村成功践行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8.92 万元跃升至约 210 万元,增长约 23 倍,成为从“搬得出”到“稳得住、能致富”的典型缩影,是宁夏移民村产业发展的典型写照。

本文采用探索性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记录了案例整个演化过程的特征,这些特征是最主要的,也是比较明显的。案例调研时间始于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后在 2024 年 11 月和 2026 年 5 月进行追踪调研。案例研究把时间性引入之后,阶段间的变化有一个作用机理(王凤彬和张雪,2022)。本文对红川村产业调整、发展的过程、劳动力收入、产业与项目结合等实践进行详细分析,阐述了该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和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以及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因素如何有效结合。在描述案例的过程中,本文挖掘案例演化的前因、后果、内外部的驱动力等过程机制,以及当地政府决策的主要考虑和实施效果,将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展现出来,通过关键证据链对复杂现象进行思考,提炼出“政企农协同模式”中包含的关键要素与内在逻辑。

二、案例点及其理论对话

将中国农村实践案例置于经典理论框架中展开对话,不难发现,经典理论

所描摹的理想图景,与中国农村现实并不完全契合。为此,从对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现实的观察中获得问题意识,在现实与理论的对话中寻找答案,最终从这些现实案例的追踪过程中挖掘出“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这是本文作为“案例导向的研究”的任务。作为以建构理论为目标的个案研究,本文梳理红川村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总结红川村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分析红川村案例蕴含的理论意义。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市场(资本)、国家和农户是驱动中国农业转型的核心力量(梁伟,2022)。经典理论研究城乡二元结构,各有侧重。如果按照价值再造的源泉和推动农业转型的力量来划分,即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后创造的价值、城乡融合互动发展的价值、农村就地发展的价值,经典理论研究进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传统,分别是刘易斯-托达罗传统、芒福德-塞西莉亚传统、库兹涅茨-黄宗智传统。这三种传统的分类,也体现了经典理论核心观点的前后继承性、对城乡二元结构领域研究的侧重点、内生发展与外生主导的关系。

(一) 刘易斯-托达罗传统

刘易斯的理论表明,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可以积累资本,可以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提高城市化水平,让经济由二元变成一元(Lewis,1954)。20世纪60年代,费景汉和拉尼斯构建了拉尼斯-费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与刘易斯一样,该模型认为,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可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不同,拉尼斯和费景汉分析了两个过程: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过程,以及农业劳动力流出引起农业部门的变化过程。若工业部门要吸引这些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就需要按其边际产出支付劳动报酬。拉尼斯-费模型表明工资水平由市场力量决定,农业劳动力变为竞争市场的商品(Fei and Ranis, 1964, p. 324)。之后,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了托达罗模型,这个劳动力转移模型建立在不充分就业假定上。农业劳动力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其原因有二: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二是城市的不充分就业情况,即存在失业率。当城市失业率升高时,即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大,农村劳动力也不会轻易作出迁移到城市的决定(Todaro,1981)。

刘易斯-托达罗传统演示了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现代化蕴含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进程中。这一传统的核心是市场和资本驱动下的结构转型,过多强调农村发展转型的外生主导,即该研究传统忽视了农业农村部门的价值,将经济增长的区域狭隘化地界定为城市而非农村,传统农业部门是被改造的对象,乡村只是要素供给地,没有发展主体性。

该传统无法解决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地务工的难题,对红川村大龄

劳动力(包括45~55岁的中年人和少数60岁左右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如何就地解决就业、劳动力就地市场化的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随着红川村设施农业的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有了新的出路——留在本村务工。剩余劳动力并不是单向地由农村到城市,农业部门不再是工业化国家的消极部门,而是变成生产加工场所,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经济责任。对于那些具有投资价值、具有资源禀赋的农业乡,政府通过投资产业基础设施和具有生产性的基础设施(生产、加工流通、产业服务支撑),来实现就地就业(如扶贫车间)。扶贫车间既是中国西部地区乡村场域中涌现的典型政治经济现象,也是红川村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二) 芒福德-塞西莉亚传统

1961年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中指出:“城与乡,不能分开;城与乡,是同等重要的;城与乡,应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Mumford et al., 2005)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成为其研究共识。加拿大学者麦基提出了亚洲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式——Desakota模式。1985年麦基提出一种新型空间结构,在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泰国、印度、中国的经济核心区域出现了一种与西方的都市区相似但发展背景完全不同的结构,1987年他提出了Kotadesa概念。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麦基采用Desakota表示已实现了经济形态转型的原乡村地区。麦基认为,Desakota这种以区域为基础的城市化现象,其特征是“高强度、高频率的城乡间的相互作用,混合的农业和非农业活动,淡化了城乡差别”(McGee, 1991)。Desakota理论具有普遍性但有待完善。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即Desakota区域)发展是亚洲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乡村“非农化”成为主要动力。塞西莉亚·塔科里(Tacoli, 1998a, 1998b, 2004)回顾了近年来“城乡相互作用”的研究,提出了“城乡连续统(the rural-urban continuum)”的概念,认为“生计”基础是城乡的主要区别,并认为国家仅需改善城乡间基础设施(Tacoli, 1998b)。在之后的研究中,塞西莉亚指出农业增长必须联动城市市场与资本(Tacoli, 2004)。肯尼斯·林奇在发展理论背景下,详细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城乡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Lynch, 2005)。

芒福德-塞西莉亚传统探讨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可能的具体形式,看到了城市和农村互动的价值(如城乡融合),该传统强调通过国家的规划与投资来重塑城乡关系,将现代性和总体性问题的解决更加聚焦化,是对刘易斯-托达罗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和发扬。该传统站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理论描绘的图景更聚焦实际问题。然而,该传统将农村内生发展与城市的外生推动视

为两个独立主体,未形成耦合统一的机制。

若将红川村放在芒福德-塞西莉亚传统下讨论,发现红川村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剩余劳动力收入增长、人口转移和就地吸纳(家庭结构)、产业可持续发展等发展任务,以及城乡规划中的产业规划是上述理论未探索的空白之处。在红川村,农村劳动力留在本地,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任务,村庄经济发展动力在于农业产业化,城乡互动的背景是“农业产业融合化”而不是“非农化”。地方政府通过城乡规划协调,尤其是农村产业规划如何利用城乡互动的趋势,将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辐射和支持结合起来,从而做到农村的发展不脱离城市、匹配城市发展所需,链接城乡之间的“流”。

(三) 库兹涅茨-黄宗智传统

西蒙·库兹涅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中,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具有的几种“贡献”,即产品贡献(包括粮食和原料)、要素贡献(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和市场贡献,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得收入的贡献(Kuznets, 1963)。在之后的研究中,库兹涅茨认为,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过程,可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水平(库兹涅茨, 1985)。黄宗智指出了农村内生发展的困境所在:一方面应维护农户家庭的经营核心地位,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农户联合而形成的合作组织,来负责单个小农无力承担的农产品加工和销售,把农产品产业链中的大部分利润归于农户^①。

这一传统看到了农村内生发展先天不足这一现实,如生产效率低下和小农理性行为局限等,也指出了发展农业的价值。然而,黄宗智的观点忽略了国家在乡村的介入,只强调了外来资本对农村经济的不利影响,高估了农户联合对于市场动态信息的把握能力和市场范围的拓展能力。在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不仅动员村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还动员村民流转土地,更为关键的是已经代替农户联合在农产品加工上的投资支出。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要解决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还有中年甚至老年这些剩余劳动力的收入问题。看似悖论的事实是,红川村的这场农村经济发展巨变恰恰不是由农户联合起来主导,而是政府引导和组织以小农为主体的合作社,同时借助招商引资引进农业企业的力量,将农村变成设施农业发展之地、解决低收入农民群体收入困境之地。

(四) 农村产业发展研究

前述理论为不同城乡关系下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解释框架。而在中国地

^① 黄宗智:《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爱思想”网站,2014年9月15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324.html>。

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农村产业发展案例,其丰富的内涵已经超越了上述三种研究传统的理论范畴。从发展困境来看,西部地区农业发展面临基础薄弱、资金不足、投入分散、效益低下、产销不畅等挑战(张绘,2022),存在农户缺乏内生动力和发展不可持续(刘璇和秦婉聪,2023),以及西部地区农业产业的同构问题(邱蓉,2021)。在这种政府资源注入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输入容易导致集体经济陷入“创收有限”“可持续发展乏力”的困境(黄六招和秦春阳,2024),不同类型的“项目进村”的治理效果存在巨大差异(秦振兴和王远,2025)、“项目进村”实施中存在着行政能力弱化(曹海林和周全,2023)、“项目下乡”导致治理过度行政化(李祖佩,2023)以及引发产业同质化、资金碎片化与村干部“角色-能力”错位三重风险(刘梦玲,2025)。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现有成果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从产业筛选来看,面对西部地区农业产业的同构问题,应从宏观层面制定和发布指导性的农业产业规划(邱蓉,2021)。从产业链建设角度来看,有研究指出了政府进一步支持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现实依据(李夏欣和宋文豪,2026)。具体来看,可以通过市场嵌入式外向突围机制重构产业价值链地位(寿金杰和陈文烈,2026),不断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为其改善外部环境和创造支撑条件(张林等,2020)。从产业发展动力来看,村庄产业发展能力提升应以村庄内生动力激活和内部资源整合为起点,通过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引导,进一步激发培育村庄的产业发展能力(周佩莹,2024)。其中,项目是驱动农村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让“项目进村”摆脱外部赋能难以转化为内生动力的困境(刘姗和吴理财,2025)。此外,地方政府支持农业的行为应遵循一定逻辑,如产业发展生命周期演化的逻辑(郭红东等,2024)。地方政府根据产业面临的发展瓶颈,采取差异化的嵌入措施,在产业艰难起步期,可采取“制度嵌入”,在产业适应调整期,可采取“资本嵌入”(毛春梅和姚清,2025)。总之,上述研究肯定了农村就地发展产业的价值,基本沿袭了库兹涅茨-黄宗智传统。同时也指出西部农村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依赖、治理风险与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宏观治理的改进方向。

(五) 分析框架的提出

综上,经典理论的三种传统存在着这样的前提假设:城市具备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农村自身资本生成能力不足,必须依托城市资本补给;农村经济可以靠城乡市场自发循环开启,不一定需要国家力量。用中国西部农村产业发展实践去反思、修正这三个研究传统自带的前提假设,是十分必要的。国内关于农村产业发展的研究,未深入揭示外生引导赋能向内生动力转化的具体耦合机制,对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协同运行的结构化分析,以及对适配西部地区农

村产业的本土化协同发展模式的提炼都相对薄弱,尤其是在“项目进村”背景下,产业项目形成的资产产权(特别是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应如何配置,又该通过怎样的权利与组织安排来促进农村产业的良性发展,针对这些问题的新的理论解释仍有待完善。

在与上述三个研究传统的理论对话中,本文发现了红川村这样一个中国西部地区行政村发展中与经典理论暗含前提假设不同的反常现象:红川村的经济增长实践展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一种增长路径,当地政府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筛选产业)、财政投资兴建产业基础设施、给予产业补贴及保险;招商引资企业承担产业投资,企业有序组织村民种植并实现农产品市场异地匹配;行政村层面,通过流转土地、组织动员村民就地务工,并实现本村产业项目权能的科学分置。

基于此,本文在前述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政企农协同模式”这一分析框架,将“产业筛选培育”“项目进村”“招商引资”串联为连贯过程,并引入“权能分置”这一分析概念。权能分置是“政企农协同模式”的微观运行机制,旨在通过清晰界定各主体的权责利,破解协同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难题,为激活村庄内生发展能力、提升产业发展效能提供产权制度保障。这一框架突破了既有理论中内生发展与外生引导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提出西部地区农村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外生制度引导—产业项目赋能—内生主体激活”的政企农协同耦合机制,为化解农村产业发展中内生动力不足与外生干预过度的双重困境提供了本土化解释。

三、产业发展历程及发展成效

在移民开发前,红寺堡境内土地撂荒,沙漠化程度严重,植被十分脆弱,有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趋势。红寺堡开发区认真分析区情,审视资源禀赋,综合考虑节水、投入、效益等因素,调整产业结构,主要压缩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种植面积,大力推行特色优势产业种植模式。玉米作为高耗水作物,被列入产业结构调整的行列。2004—2005年,红寺堡区制定了节水农业总思路,倡导以节水增效为中心,实现发展节水农业与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相结合,与农业综合开发相结合,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相结合。红寺堡区在提升灌溉面积的同时,增加节水灌溉面积(薛正昌,2019)。红川村现有土地12943亩,全部为高效节水灌溉土地。引进企业进行规模化种植和运营,土地流转给7个经营主体,主要种植萝卜、小番茄、枸杞等,经营主体对务工的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使当地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获得务工收入。红川村通过引进企业流转土地,村民每年可获得土

地流转费 390 万元。通过“反租倒包”^①等形式带动本村群众务工,每年收入达 1500 多万元。这逐步将农业与发展经济协调起来,使红川村朝着农业产业化方向迈进。

(一) 产业调整及发展历程

红川村作为水资源贫乏的地区,产业筛选经历了如下历程:“种植业—种植业+养殖业—经济作物+养殖业+种植业”。这个筛选过程既有村民自主探索的成分,又是政府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和农民增收目标引导的结果。近年来,红川村引进山东冲腾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后文简称“冲腾公司”)、宁夏佳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产业,冲腾公司在红川村自建并认定了 1 家帮扶车间。表 1 展示了 2022—2025 年红川村主要产业情况。

表 1 2022—2025 年红川村主要产业情况

时间	种植面积	销售地区
2022 年	种植萝卜 5000 余亩,年总产量 2000 吨左右;小番茄 650 亩(包括日光温室 53 座、大拱棚 118 座、751 平方米冷库和分拣车间),年总产量 1700 余吨,产值 3000 余万元	河南、湖北、山东、江苏等地
2023 年	种植萝卜 6500 亩、西瓜 1320 亩、枸杞 2500 亩、番茄 1000 亩,新建日光温室 40 座、设施农业种植面积 195 亩、产量 2216 吨	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地
2024 年	复种萝卜 3000 亩,种植西瓜 810 亩、天花粉 60 亩、向日葵 240 亩、辣椒 700 亩、小番茄 1600 亩	南方各大市场
2025 年	种植萝卜 1143 亩、小番茄 1020 亩、玉米 3197 亩、枸杞 1300 亩、小麦 1850 亩	河南、湖北、浙江、江苏、山东等地

红川村产业发展始终遵循规划意识,主要体现在产业规模化、产业结构调整和高附加值化(见图 1)。新庄集乡三次派出马渠工作组,就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这种规划意识。村庄规划服务本村发展大局,在产业层次、土地储备上有明确规划。

红寺堡区政府与保险公司协商制定农业种养业相关保险补偿政策,并扩大保险范围,使农民无后顾之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种养业结构调整的风险,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动员村民调整产业结构上,红寺堡区采取了调查摸底、技术指导、引进企业、产业政策、保险补偿等措施,降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困难和阻力。红寺堡区结合实际,出台了《红寺堡区 2017 年特色种植业及肉牛产业扶持政策措施》,筹措资金 1000 余万元,加大对特色种植业的扶持力度:对

^① “反租倒包”是指村委会将承包到户的土地集中到村集体,然后将土地的使用权承包给农业经营大户的土地经营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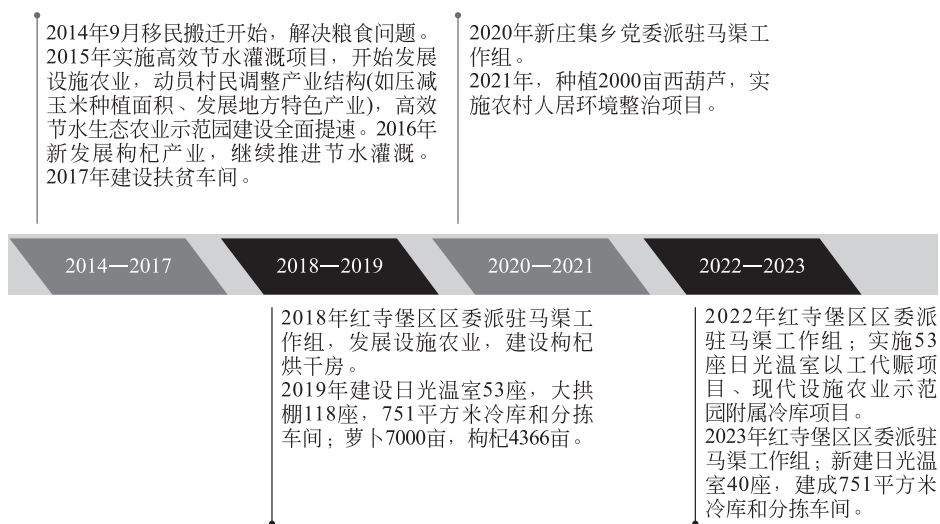


图1 红川村产业发展演进图谱

新增枸杞、黄花菜、中药材、优质牧草(苜蓿)、经果林等产业,分三年按照3:1:1的方式给予项目扶持,即新增每亩特色产业第一年给予300元,第二、第三年分别给予100元财政补贴(见图2)。这项政策启动并深化了红寺堡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进程,有效促进了产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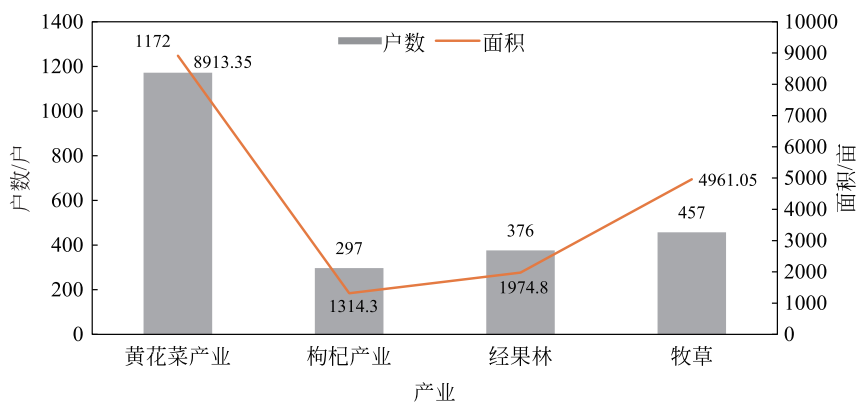


图2 2017年红寺堡区各产业结构调整(兑现资金项目)的户数及面积统计

数据来源:红寺堡区统计局。

2018年红寺堡区调查队走访了10个村、100户农户,对农村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开展调查摸底,编写结构调整方案,制定产业政策。单纯依靠农户有限的经验和非专业知识,难以满足种植经济作物(如设施农业)的技术要求,无法分散风险,这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为推进。为

了及时化解产业结构调整中遇到的缺乏种植技术和经验的问题,对调整后的产业做好技术培训,红寺堡区安排技术员轮流进村入户下地指导种植。红川村开展枸杞修剪、苹果修剪等培训,有效提升农民实用技能。

2018年新庄集乡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积极引导发展高效节水农业,这一产业结构调整原则贯穿始终。2019年在红川村种植萝卜7000亩、枸杞4366亩(吴忠市红寺堡区史志编纂领导小组,2020),培育马渠萝卜种植示范村。

2020年2月发布《红寺堡区2020年种植业结构优化调整实施方案》,继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逐步形成了以酿酒葡萄、黄花菜、枸杞为主的效益较高的“3+X”区域主导产业。在以往基础上继续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6万亩,调减后用于种植优质牧草(青贮、苜蓿、苏丹草等)5万亩,特色作物1万亩。其中,新庄集乡种植优质牧草1.5万亩,特色作物0.1万亩。有了产业结构调整及成果,还需要解决如何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延伸产业链条、创建品牌、开拓销售渠道等方面的问题。红川村招商引资的设施农业企业,通过订单收购,建设农产品加工厂、储藏冷库、烘干设备,延伸了农产品产业链条,增加了附加值。这构成了红川村产业在链条上的融合。

红川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思路是以发展高效节水农业为主,在保存原有产业留床面积的基础上压减玉米种植面积。此外,新庄集乡政府还与新疆兵团勘察设计院(提供农业规划咨询,如土地利用规划、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产品加工与储藏等)对接,协商研判适合当地的产业,在马渠移民安置区种植萝卜和枸杞。新庄集乡对各个行政村进行产业定位,以实现各村之间的差异化竞争,在“一村一品”的基础上做大产业片区,如马渠枸杞、小番茄产业片区、萝卜种植示范基地,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2015年至今,红川村积极落实种植业结构调整政策。

有研究指出,如果认为中国的农村小市场贸易是“余缺调剂”,具有补充自然经济的性质,那么这种观点忽略了产地市场的重要性,这些产地市场汇集起来就产生了巨大的交易量。而长距离贸易也是基于产地市场产生的。帕金斯(1984,p.158)估计,19世纪末中国农村产品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商品占总产量的7%~8%。该研究虽然针对传统的中国农业,但其关于产地市场与长距离贸易关系的分析,对理解当前农产品跨区域流通仍具有借鉴意义。县里农产品贸易可以区分为长距离贸易和短距离贸易。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如果只按照农产品运出县境就算长距离贸易,这对分析红川村农村经济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红川村的农产品的销售地原来主要是本地市场,养殖的牛羊和种植的小麦等,到现在发展设施农业种植小番茄、萝卜和枸杞,可以长距离运输到南方市场。这种转变降低了红川村对本地中心城市银川和吴忠市的依赖,弥补了中心城市辐

射效应低的不足。

红寺堡区政府通过引进企业,尤其是现代农业生产企业和农业科技综合服务企业,探索新型经营模式,利用市场机制充分整合资源,让当地农民在企业经营的项目上务工。红川村的产业发展得益于种植范围的扩大和种植结构的调整,更得益于引进的企业主体开辟新的市场。关于市场范围,巴泽尔(2006)在《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中曾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市场范围的缩小会降低分工的深度。反之,市场范围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红川村引导村民在主导产业链上就地务工,并加强与南方省份的区域联动,企业则负责向更广阔的市场拓展,从而实现了城乡融合下的产业发展(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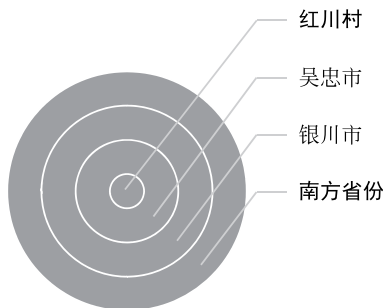


图3 红川村主要农产品销售的市场范围

来源:作者自制。

红川村的农产品为发达地区市场供应作出了贡献。农产品的销路和渠道有了保障,农村经济增长驱动力就有了保障。由此,红川村获得了相对优势。产业发展带动劳动力就业,村民收入获得大幅度增长,村集体收入也实现了快速增长。这种相对优势的激发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结果:政府投资产业项目减轻了行政村及村民投资负担,政府招商的优质企业负责将本地优质农产品以较高价格销往南方市场,既可以让务工村民获得收入,还能坚定企业在当地投资的意愿。

得益于红寺堡区政府规划和引导,红川村发挥丰富的生态资源(土壤、空气)优势,种植长美大根白萝卜。该品种生长周期短、产量高,投资成本低,适宜在透气性及排水性能较好的沙壤土中种植。在销售方面,红川村通过跨区域对接发达地区巨大的消费市场,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如萝卜主要销往河南、湖北、浙江等地,小番茄则销往山东、江苏、四川、福建等地。红川村的小番茄不容易发生病虫害,果实色泽好、果汁浓郁,维生素含量高。两种产业都是政府因地制宜发挥当地气候资源优势的结果。红川村整合本地生产、本地加工、产销对

接等多种业态,推动了一二三产业在空间上的聚合,形成功能互补的空间融合格局。红川村作为城乡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引起生产空间变化的案例,走出了一条城乡间产品市场异地匹配的路径。

总之,自红川村建制以来,设施农业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培育了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特色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当地农业生产方式顺利实现“雨养农业—灌溉农业—现代农业”两次根本性转变。

(二) 产业基础设施与农业项目

在探讨红川村经济发展的时候,需要审视两个概念——“共性落后(无差别落后)”和“惯性落后”(叶嘉国,2020),并探究之前经济落后的原因。“惯性落后”地区将滞后型发展归因于地理、区位、产业基础薄弱,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较多等因素。不过中国不少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往往是同步发展的,如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这表明了改造农村产业基础的必要性。然而,若将红川村搬迁之初的发展滞后归结于上述因素,还无法揭示深层次的原因。

舒尔茨(2006)提出把传统农业改造成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的关键在于对农民投资。红川村对农民的投资不仅仅是教育和在职培训,还有广阔土地上的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产业项目与农业融合发展。红川村距福银高速入口处的大河收费站 40 千米。通往红川村的道路以沥青路为主,村内道路以水泥路为主。从 2014 年以来,红川村先后实施了多个产业项目,项目建设情况的主要特征为:政府投资项目+企业招商项目(见表 2)。地方政府通过筛选产业(选择和培育)、提供正外部性补偿(兴建项目、投资基础设施),为农村产业发展、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表 2 红川村历年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新庄集乡红川村养殖园区改造项目	2021 年建设牛舍 4 座及基础配套设施
新庄集乡红川村肉牛养殖基础设施以工代赈项目	2022 年新建育肥牛舍 5 栋,配套建设双侧运动场、运动场围栏
新庄集乡红川村设施温棚以工代赈项目	2022 年新建温室大棚共 28 座(每座大棚长 120×18m),碎石铺设道路等
新庄集乡红川村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附属冷库建设项目	新建冷库、穿堂,建筑面积共计 751 平方米及其他工程
红寺堡区新庄集乡马渠生态移民安置区枸杞烘干房项目(三期)	成品防护棚 4 座、生产设备、柜式移动式污水处理设备、清洗车间 200 平方米

数据来源:红川村村委会。

新庄集乡实施的项目与主导产业的关系紧密,如项目谋划和实施考虑的因素主要是壮大红川村的主导产业。新庄集乡充分利用中央以工代赈资金^①,先后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等方面精准谋划实施项目,实现了改善民生福祉、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群众收入等多重目标。红川村也申请了中央以工代赈资金和自治区统筹资金,现建成设施温棚 109 座,全部承包给招商来的企业,三年一签约,每座大棚年租金收益稳定在 1.6 万余元,主要品种有小番茄、辣椒等经济作物。另有小拱棚 245 座,农户在企业的指导下租赁种植,充分发挥产业联农带农作用,带动群众就近务工。

红川村肉牛养殖基础设施、设施温棚以工代赈产业项目等,破解农村内生资本形成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改善了产业面临的“小、弱”局面,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基础。项目对产业的发展是一种赋能,是减轻农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负担的重要举措。项目还延伸了当地的产业链,是对当地主导产业进一步规范化发展的积极回应。

(三) 扶贫车间与产业

“扶贫车间”也被称作“卫星工厂”,是指以扶贫为目的,设立在乡镇、村的加工车间。其宗旨是带动脱贫和解决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就近就业问题。2020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吴忠市考察时指出:“兴办扶贫车间目的是扶贫,要坚持扶贫性质,向困难群众倾斜,多招收困难群众就业。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虽然收入不比进城务工高,但省去了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还能照顾家庭,一举多得。企业参与兴办扶贫车间,体现了先富带后富,很有意义。”^②现在扶贫车间被称为帮扶车间。国内关于扶贫车间的研究,代表性观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动员论,即基层政府积极动员工商企业依托贫困地区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农业产业,扶贫车间作为生产加工场所,实现就地工业化(刘岩和任大鹏,2023)。二是车间政策性论,因政策驱动而出现的扶贫车间,与追求市场和劳动力的市场企业不同,“扶贫车间”是追求社会公益的社会企业,它所提供的生产空间构成保护弱势劳动者权益的有力屏障,其面临的最大隐忧是可持续问题(李超海,2021)。不过上述研究没有揭示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农村也有扶贫车间,却没能带来产业可持续发展;在频繁的农村产业结构变动或调整中,应该把握什么原则,才能让扶贫车间助力农村经济发展?

红寺堡区已建成、认定就业扶贫车间共 14 家,其中政府资产投资建设 11

^① 肉牛养殖基础设施以工代赈项目和设施温棚以工代赈项目分别发放劳务报酬 158.0 万元、125.6 万元,分别带动务工群众 91 人、82 人。

^② 人民网:《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2020 年 6 月 11 日, <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31742448>。

家,企业自建并认定 3 家。车间经营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利用当地土地资源发展设施农业,二是从事加工业,三是为产业提供附属或配套设施^①。第一种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最大化开发利用所在地的自然资源,产品具有绿色环保的属性,能取得较好的市场价值,对集体经济和农村产业发展贡献大,带动的劳动力数量多,村民务工收入高。第二种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也面向国内,少数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具有农村工业化的特征。这种从事加工业的车间因外部市场环境起伏波动,经营效益不如第一类车间稳定,且带动劳动力的数量较少。第三种模式下车间的运营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在众多的帮扶车间和同质化的发展思路下,红川村的车间、产业与项目对集体经济和产业的带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连续三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50 万元,2025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更是达到了 210 万元,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与村民务工收入同时增加、产业稳定发展三者兼得的目标。

2017 年红川村开始建设扶贫车间,扶贫车间均为政府投资、村集体所有、企业租赁运营。政府通过招商引资选择适合当地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和结构的企业。新庄集乡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福建在宁企业宁夏鑫富美包装有限公司,在红川村开办第一家扶贫车间,主要从事冷链包装产品加工项目,加工装小番茄的塑料框。这表明,租赁帮扶车间的企业在产业链上延链,从“种植—粗加工”到“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实现了产业上下游的配套,村民务工收入本地留存率高。这是红川村帮扶车间与其他行政村帮扶车间的不同之处。

(四) 村集体与劳动力的收入

2014 年左右,红川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经商,不仅造成农村经济开发不足,也使当地产业既没有特色又难以富民。可以说,当时红川村未能将当地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有效转化为经济发展资源,尤其是人口持续外流,依靠村里留守村民发展经济,是红川村发展滞后的深层原因之一。

尽管当地政府在培训农民,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工艺或技术,但是毕竟成为熟练工周期较长。那些具备一定手工艺(或技术工种)的农民工是稀缺的劳动力,在村庄占比较低,且多选择外出就业,而其余中年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对红川村劳动力务工地点采用 NVivo 15 词云分析,关键词字体越大,代表出现频率越高,对应的人数就越多。如图 4 中“吴忠”“银川”相关地点字体最大,意味着在两地务工的劳动力最多,去外省务工的劳动力也较多。然而,随着红川村设施农业的蓬勃发展,传统劳动力外流趋势发生明显转变,表 3 展示了

^① 如红塔村车间生产编织袋,田原村生产户外装备用品,玉池村建设附属用房和配套设施,团结村加工外贸服饰,弘德村车间加工纸箱、纸盒、礼品盒,同原村加工服装。

的初加工方式,如分拣、包装等,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分拣车间里,村民们从事清洗、分拣、称重、包装、预冷并通过冷藏车运输,发往全国各地市场。每一个环节或程序,村民都深度参与,逐渐变成熟练工。

萝卜和小番茄两个产业主要吸纳了红川村 40~60 岁的劳动力。每年 4—6 月这段时间属于小番茄生长期,每天大约有 150~200 人在基地务工。这些村民提供间歇性的劳动供给,同时兼顾家庭(接送小学生、照顾生病的老人等),具有灵活就业的特征。从 2018—2025 年的数据来看,这种灵活就业的村民人数逐渐增多(见图 5)。设施农业发展壮大后,成为吸引村民灵活就业的重要产业,红川村村民在家门口变成了“产业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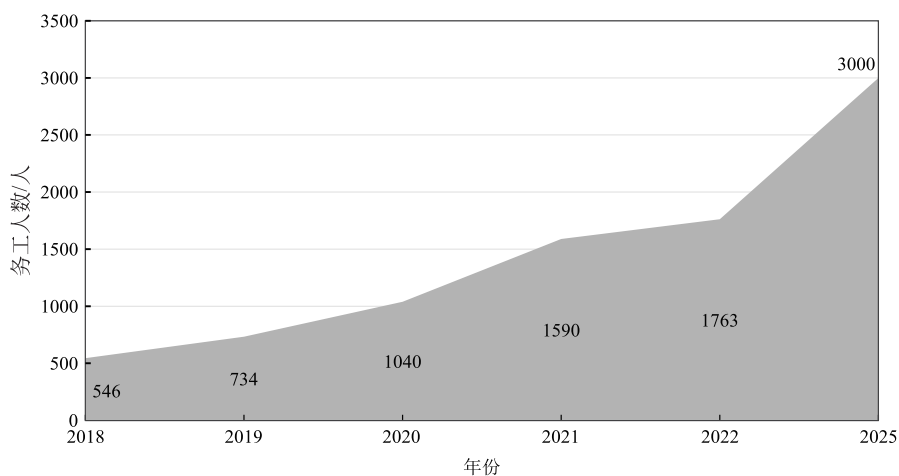


图 5 红川村 2018—2025 年务工人员人数

数据来源:红川村村委会。

红川村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仅仅依靠和红寺堡区的城乡融合,还通过红寺堡区的规划引导,让其他企业的资金、人才、生产方式、市场网络持续向红川村转移扩散,促进红川村全面进步,城乡呈现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有研究对企业、消费者、公共行为体以及各类集体影响市场形成和变革所做出的努力进行了研究(Nenonen and Storbacka, 2021)。红川村农产品销往南方市场、本村劳动力实现本地就业的现象,不是由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市场自发成长带来的,而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政府与企业通过“政府投资部分基础设施+产业招商+劳动力吸纳”形式实现村民收入增长,破解红川村基础设施短板,降低交易成本,为小番茄等农产品从地头到全国市场的全链条形成提供关键公共支撑。尽管红川村有土壤等自然优势,但若仅仅依靠当地村民,无力承担高昂的设施农业投资成本,很难跳出“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当地村民不擅长农产品经营(包括品质

控制、品牌运营、产品营销、市场拓展)。这也间接表明,若当地村民主导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种植到最终的销售),则无法避免潜在的风险或可能的失败。此时,家庭的理性选择不是从事生产而是就地务工。

阿马蒂亚·森(2013)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提到,“进入劳动市场的自由,其自身就是对发展的显著贡献”。在自由进入劳动市场方面,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而这种增长为青壮年劳动力务工带来了机会。红川村也有在宁夏银川、吴忠市务工的村民。不同于“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所认为的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带来收入增长,使社会总财富增加,让经济增长能够有效惠及低收入人口(尤其是中老年人口、轻度残疾人口、留守在家的妇女等),城市经济增长对这部分群体的溢出效应较低,即经济整体增长的分享性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自身调整十分有限。红川村的发展路径为这部分群体带来了“进入劳动市场的自由”,大量劳动力留在本村从事设施农业方面的工作。

综上,红川村通过四种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村民收入增长的目标(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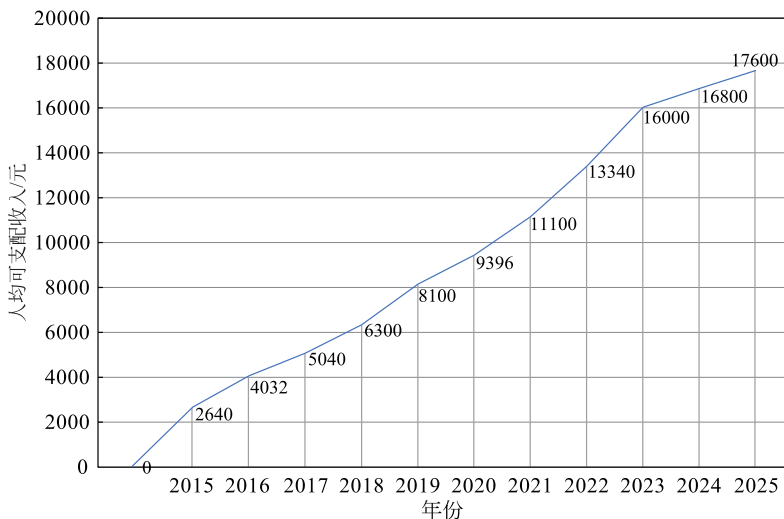


图6 红川村2015—202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红川村村委会。

一是通过政府项目建设提高村民收入。以工代赈项目实施时,要求将20%~30%的项目资金用于发放本村低收入人口的劳务报酬,这些低收入人口为政府项目实施提供劳动力,获得报酬。2022年,以工代赈资金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入股红川村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方式,为村集体带来每年80万元的分红收益。此外,政府在红川村投资建设的项目优先雇佣本村村民,并支付劳动报酬。这种利益联结机制可以概括为:“政府+企

业+村民”。

二是社会商业机构为村民可能的损失提供保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经济脆弱性”的概念,该概念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承受未预料到的事件冲击所造成损害的能力”(Guillaumont, 2000)。红川村自2020年开展农业保险,保险对象是枸杞、基础母牛、基础母羊、日光温室,为村民遭受意外损失时提供补偿^①。农业保险的出现正是降低红川村“经济脆弱性”的有力工具。

三是红川村以“反租倒包”形式给村民发放土地流转费。将土地流转给招商引资来的农业企业,企业进行规模化种植,村民获得土地租金。这种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行政村+企业+农户”。

四是村民在设施农业产业园务工获得收入。以前红川村村民自己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村民作为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存在困难,面临销路不畅、农产品价格起伏波动等风险。乡政府招商引资的企业进行产业化运营,村民只负责在企业的园区种植(除草、修剪、采摘、挑拣、分箱、包装、运输),获得务工收入。这种务工具有时间灵活、周期较短、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等优势,有助于肉牛养殖户兼业化就业。截至2025年12月,红川村村民的工资性收入为12320元,占70%,经营性收入2358.4元,占13.4%,财产性收入387.2元,占2.2%,转移性收入2534.4元,占14.4%。这一收入结构印证了产业发展带来了村民收入增长。这种收入增长离不开企业进入农村后弥补农户对接大市场这一短板。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行政村+企业+合作社+农户”。小番茄产业形成“党支部+企业+村集体+劳务组织+农户”利益联结模式,市场机制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得以体现,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群众务工双增收。

红川村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总体非农技能素养较低。以往的发展路径下,当地农牧产品的外部市场竞争力十分有限。与部分地方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农产品本地内部消费的保护模式不同,红川村实现区域联动,将红川村变成发达省份的生产基地、产品基地,产业与市场实现异地匹配,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此时,红川村作为欠发达地区行政村,地方政府打破那种受行政区范围、交通条件、地理条件等限制的经济困局,红川村的产业链得以延伸、外延扩展,空间范围变大,从“区域内循环”变成“区域间循环”。

四、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有研究对项目进村的“分级运作”机制进行讨论,在县-村关系、乡-村关系

^① 红寺堡区《2020年“扶贫保”优势特色产业保险实施方案》(红开发〔2020〕21号)。

下分析了项目运转的影响(张良,2023)。尽管指出了依靠技术治理存在对乡村两级组织激励不足的问题,但是对项目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下的运作没有涉及。有研究从理论上指出政府通过项目实现了对市场的引导并为市场主体提供政策引导与服务(刘述良和吴少龙,2023)。然而,项目作为“分级运作”的一种治理方式,其治理结构中权力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逐渐分散,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国家治理。项目作为政府推动红川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项目与产业的良好结合及项目的有效运营,表明当地政府有效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红川村发展的最大特点。这是因为红川村在产业发展和项目经营中有效界定了政府与市场在内外环境中的角色和任务,对不同环境中委托代理存在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一) 内外环境下的产业项目权能配置

图7展示了红川村及乡政府围绕产业形成的互动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红川村经济实践中的内部环境(内部协调)和外部环境(外部协调)。其中,内部环境主要指的是,乡政府可以对产业项目委托给哪个主体或组织,具有干预或授权的权力,乡政府为了实施项目、委托他人经营项目,需要履行一定的内部协调职能,而村集体也可以决定将项目授权或委托给谁。鉴于内部环境中产业项目经营者的专业素养不足、发展经济能力较弱,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产业发展所需的市场思维、风险控制机制、激励机制等,使村干部或村民经营本村产业项目时,要面对标准化生产种植、加工销售、品牌建设、独立开拓市场的巨大挑战。如果项目的运营仅仅局限于内部环境,则风险不可控,且风险易转嫁给村集体或乡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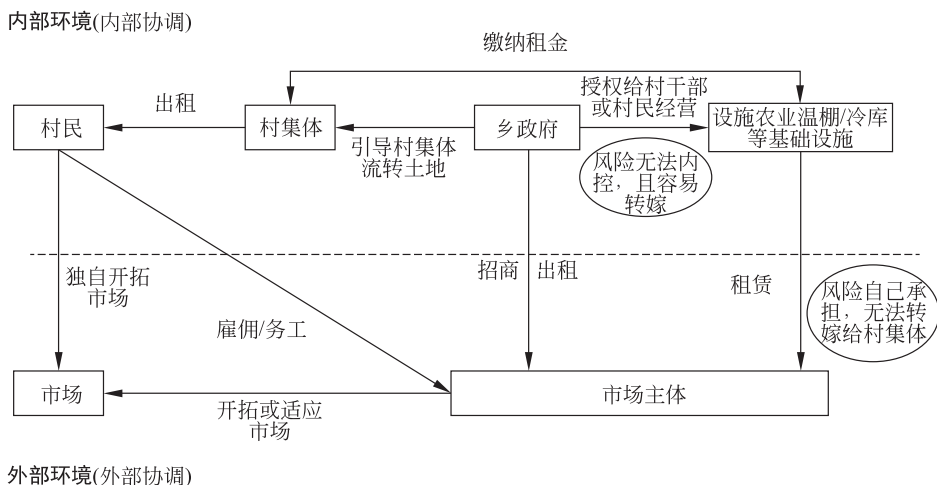


图7 红川村经济实践中所形成的内外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7中,虚线以下是外部环境。乡政府和村集体通过招商和出租等形式将产业项目的经营权委托给有实力、有经验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在从事产业经营过程中风险不能再转嫁给村集体,市场主体需要履行外部协调职能。“政府放权”为“市场成长”提供了可能。红川村选择的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农业经济主体,这构成了红川村产业发展最显著的特征。红川村的发展模式也说明,对于一个行政村来说,善于把握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下的“社会时间”很有必要,如准确的产业选择、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自然时间的流逝不一定能带来这些行政村的产业繁荣^①。这些市场主体有着成熟的市场渠道,所以开拓或适应市场能力强。这种环境中市场主体向村集体缴纳租金,盘活村集体项目,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带动村民就业,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多重目标。产业发展若处在外部环境中,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分工较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多依靠市场主体的经营。

村集体委托给村干部或村民,村集体委托给其他市场主体,这两种代理方的代理成本不同,经营风险不同。红川村的设施农业大棚、帮扶车间、冷库均由招商的企业租赁经营,企业向村集体支付租金,村集体又将这些费用作为分红发放给村民。图7中的箭头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收入流方向:村民等承包产业项目获得经营收入,村民在产业项目建设中务工获得工资收入(以工代赈项目),村民在企业主体经营中获得务工收入。相比之下,第三种收入来源相对稳定。图7区分出内外部环境,其根本原因在于村集体经济项目权能配置决定了其产业项目的经营效果,经营权、收益权和控制权灵活务实的权利安排,使得村集体经济的经营风险大幅降低,决定了产业发展进程中利益联结机制的稳定与否。

(二) 政企农协同模式与经典理论的假设

前述内容总结了三个研究传统所包含的三个前提假设。而中国西部地区红川村的农村产业发展实践,对这三个前提假设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反思。

反思一:西部地区村庄依托本地区中心城市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可能只是美好愿望。

红川村远离本地区的中心城市,如银川和吴忠市,省域或区域经济中心对红川村的辐射效应较弱。村民在市场中的生存能力尚有限。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统筹协调,企业的引进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外部助推力,将外部资源下沉到村,与本地农业资源结合,既是红川村发展路径的最显著特征,也是红川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大动力,走“农业产业融合化”而非“非农化”的道路。

^① 关于社会时间和自然时间的区分,可参见杨虎涛(2008)。

反思二:西部地区农村资本市场的狭小与融资渠道的单一。

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不仅当地自有资本稀缺,而且融资渠道狭窄,难以完成规模的资本区域汇聚与投入。所生产的农牧产品销售市场狭小且扩张困难,市场空间主要集中在本地区,竞争的结果是红川村的产品退守本地市场。一些地区单纯先投资再进行产业规划,则产业发展难免陷入被动。尤其是一些行政村盲目上产业项目,不等于有经济发展;有产业项目不等于有良好运营,尤其是那些政府投资的产业项目,与农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匹配、助力关系更是如此。这种惯性思维既是误区,也是发展的障碍。通过政府规划、咨询和论证,确定要发展的产业,再给予基础设施方面的配套,使得招商引资的企业能减轻投资负担,此时政府投资就有了积极效果。这表明,在政企农协同模式中,政府与企业是破解融资困境的关键力量。

反思三:离开政府的力量开启农村经济增长,在西部地区不可行。

尽管西部地区的农村具有一定的自然禀赋优势,但是将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有很多挑战。红川村的案例揭示了政府在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介入方式、组织方式、协调方式,没有政府力量,单纯依靠村委会、合作社或者企业,这种发展格局是难以轻易实现的。红川村案例给出了西部地区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的一种探索,回答了在人均有限的土地资源基础上,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政企农三方协同,政府提供政策、资金支持,更承担着规划、协调的角色,培育壮大产业,为企业和农户的参与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同时通过产业项目的权能配置,避免了政府直接干预经营产业的弊端。

五、研究结论

埃米莉·查姆丽在《非洲本地的制度和经济发展》一文中发问:“是什么因素在阻碍当地制度促进经济更快地发展?”(Chamlee,1993)同样地,与红川村情况类似的、有产业项目的行政村,上级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为何有些村产业和项目匹配结合不好,没有带来当地经济更快发展?仅看地理位置、政策、村资源禀赋,各村相同点多于不同点,它们的差异只有在市场运行中才显现出来。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市场活动才能获得资源和产业的真实价值。仅仅要求政府重视项目、重视产业发展,还无法体现乡村产业的市场价值。

(一) 政企农协同模式的引出

红川村的发展模式是否对前述理论对话的研究有所超越,需要从实践和理论方面进行回答。从实践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当地农村经济增长有着重

要影响。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更多还是依靠政府介入,上项目、筛选产业、城乡规划、招商引资等。当前红川村正处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历史阶段,当地政府从发展战略、政策引导和产业项目实施等多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对农村产业进行振兴。正如有研究指出,乡镇政府集中资金和资源打造个别村庄成为普遍现象(梁琦,2023)。这些项目进入农村,带有“经营村庄”的要求与使命,在多元激励下,乡镇政府借助项目进村的形势要求,集中体制内资源打造村庄(李祖佩和钟涨宝,2020)。这些研究成果对于项目进村后的价值再造过程缺少关注,尤其是缺乏村集体项目与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对新时期城乡二元关系的处理对于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可见,产业项目在乡村价值再造过程中是有挑战和难度的。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展现了地方政府如何对红川村进行整体规划开发和价值再造,如何通过产业项目的权能配置,使得村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实现双增长。

从理论意义来看,经济学很清楚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协调往往比政府控制更具效率优势。但在第三世界国家,却很少看到与此相一致的政策结论(Chamlee,1993)。反观红川村的实践,走出了“第三条道路”:红川村充分发挥“政府协调+市场协调”搭配的作用,其中,政府协调体现在土地流转、土地征用、项目建设等方面,市场协调体现在产业选择、项目运营、市场经营、用工吸纳等方面。实施后的产业项目产权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享有经营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一般来说,项目的收益权和处置权归村集体所有,而经营权有时候归承包的市场主体,或者行政村的村干部。红川村的案例的启示在于,政府与市场各自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上述搭配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原则性的,其根本目的在于务实解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印证了如下观点:“国家不是在市场外部,而是在其内部发挥作用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事实上有两个经济调节者,两种经济协调方式或者两种资源配置机制,它们相互结合,但也相互区别。”(孟捷,2023)

至此,本文总结出红川村政企农协同模式。该模式是指发端于 21 世纪初西部地区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弱、产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增长乏力之时,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历史时期,通过“政府规划+产业项目+帮扶车间+招商企业运营”的有效组合,以及城乡融合、产业链融合、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等项目的实施,所形成的一种就地发展农村产业、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方式。红川村是政府引导发展农村经济的典型案例。该村的发展依靠产业项目带动,项目在政企农协同中的作用体现为提供协同支撑、搭建协同纽带。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再是城市单向地对农村资源输入,也不是农村向城市的要素流入,而是农村产业化、车间化、融合化,即将农村变成农

产品生产加工之地、一二三产业融合之地。这种模式下,招商引资的企业充分挖掘当地的人力优势(工人成本相对低)、资源优势(产业资源优势),企业引导和帮助合作社建设农特产品标准化生产体系、质量追溯体系、营销体系,而这些体系的建设是原先的农民联合体所难以完成的。政企农协同模式中,政府干预农村经济的正当性在于为了村集体利益和集体目标,尤其是为了低收入群体,以此促进共同富裕。有效的政府干预要给“市场成长”留足空间,给“政府放权”创造可能,并借由外部资源激活村庄内生的发展动力。红川村政企农协同模式清晰呈现出:有为政府负责产业筛选、培育与配套支撑,有效市场承接规模化生产经营并拓宽外销渠道;农户与村集体依托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嵌入政企两端,实现政府公共保障职能与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有机融合,构建起乡村产业共建、共管、共享的长效发展机制。和宁夏其他地区农村不一样的是,红川村具有的优势(气候优势、土地资源优势、人力优势)被政府识别、开发和转化,这个过程伴随着政府的产业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最大程度提高村民收入,进而形成红川村的相对优势:比较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招商来的企业有能力发展设施农业、企业带来的可靠的农产品销售渠道。红川村培育的农产品不仅畅销,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二) 红川村模式的理论意义

红川村案例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本身体现了政府在农村经济运行上的机制和特征,政府介入、组织化的形式推动、筛选企业深度参与农村产业发展等,这对以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与市场关系、城乡关系理论有创新和推进之处。

相比刘易斯-托达罗传统、芒福德-塞西莉亚传统、库兹涅茨-黄宗智传统的经典理论,红川村政企农协同模式的理论意义表现在:提供了一种在农村就地开发,就地发展,就地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发展路径,政府规划和协调发挥了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并依靠产业项目,有针对性地招商引资,在政府政策设计下,企业与村民产生了利益联结机制。正确的规划、产业政策与发挥市场竞争作用同样重要^①,这既是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特色之路,也是我国制度优势的体现。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客体,在国民经济框架下探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魏后凯,2023),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农民收入低、产业发展层次低、农民就业困难等问题(简新华,2011)。红川村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依靠政府规划、项目和企业市场经营实现农村经济的多元融合发展,进而在西

^① 类似的观点在张国宝(2023,p.448)的《光辉历程:中国发展改革40年亲历与思考》一书中有相应论述。

部地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红川村的发展展示了基层政府管理经营产业的方式、经营动力与经营效果,地方政府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进行“协调、平衡、引导”,使之呈现出“产业统筹型经营”的特征:政府动员相关组织、财政资源和企业资源联合开展产业振兴,对农村的产业发展格局、发展动力和发展思维进行了重塑,打破了以往行政命令式发展农村产业的误区,转向了多元主体(政府、企业、村民)的协同“治理”。

(三) 政策设计启示

红川村的成功,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职能的正确履行。一方面,通过精准的财政补偿机制降低企业投资风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协调职能,将村民、企业、土地与市场高效统筹。这种能力的有效发挥,成功将生产要素的劣势转化为区域经济竞争优势,为筛选培育特色产业、联结村企利益、科学规划布局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红川村的研究场域,乡政府精准定位为“介入不包办、统筹不替代”,将项目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让产业实现了规模化发展。政府在农村产业项目整体经营行为中关联市场主体的经营思路,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整体规划和企业运营产业的市场化战略结合起来,使红川村的农产品获得了市场形成能力(market formation capacity),成为红川村关键的政策设计思路。项目的最终目标是更好地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生产,并在企业的努力下实现了产品异地“交换”,即有相对明确的销售市场。此外,产业选择的“适配性”政策设计、产业发展中马渠工作组的连续派遣、村民就业方面的利益联结政策设计,最终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运营、集体增效、农户增收”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为何红川村能获得比其他村经济增长更快的相对优势?红川村的项目对主导产业的匹配是成功的,是先有产业后有项目,而非先有项目再有产业,从而避免了“水土不服”,即产业前端与政府沟通衔接好,确定主导产业后进行项目的匹配。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是村庄规划,都经过了调研、咨询、论证。市场端的探索由企业负责,产业项目的经营权归企业所有,实行定向式订单农业,销售端与生产端紧密衔接,使红川村的农产品获得了外部市场的青睐。红川村发展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村民基于致富的勤劳和官员基于道德的期望,更是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的结果。

总之,本文研究探索了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新空间路径和多种融合情形下的农村经济发展,并为这种实践路径的应用提出了限定条件和前提条件,明确了经验指向,为丰富对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认识提供了一个视角。

参考文献

- 阿马蒂亚·森. 2013.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曠, 于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Sen A. 2013.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Ren Y, Yu Z,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trans. into Chinese)
- 曹海林, 周全. 2023. “项目进村”实施中的行政能力、产业推进与村民收益[J]. 社会发展研究, 10(2): 122-138.
- Cao H L, Zhou Q. 2023.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industrial promotion, and villagers' benefi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entering villages”[J].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10(2): 122-138. (in Chinese)
- 德·希·帕金斯. 1984.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M]. 宋海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Perkins S H. 1984.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M]. Song H W,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trans. into Chinese)
- 樊纲. 2019. “发展悖论”与“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案例[J]. 经济学探索, (6): 148-151.
- Fan G. 2019. The ‘paradox of development’ and the ‘factors of development’—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Chinese case[J]. Economic Exploration, (6): 148-151. (in Chinese)
- 郭红东, 白荣荣, 杨光远, 等. 2024. 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如何助推县域特色农业发展? ——基于甘肃环县羊产业的案例分析[J].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5(3): 1-12.
- Guo H D, Bai R R, Yang G Y, et al. 2024. How can local government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in coun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sheep industry in Huanxian County Gansu Province [J]. Journal of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15(3): 1-12. (in Chinese)
- 黄六招, 秦春阳. 2024. 场域约束与组织空转: 解释脱贫村集体经济政策变现难的一种视角[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6(1): 52-63.
- Huang L Z, Qin C Y. 2024. Organizational idling under multi-field constraints: a perspective on explaining the difficulty of policy realization in collective econom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J]. Journal of Tianjin Administration

- Institute, 26(1): 52-63. (in Chinese)
- 简新华. 2011. 发展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J]. 政治经济学评论, (1): 113-127.
- Jian X H. 2011.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development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 China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 113-127. (in Chinese)
- 李超海. 2021. 扶贫车间: 嵌入政策的劳动管理何以可能?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5): 58-70.
- Li C H. 2021.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hop: how labor control could be possible under seeking policy?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38(5): 58-70. (in Chinese)
- 李夏欣, 宋文豪. 2026. 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与农村居民增收——基于“农业全产业链开发创新示范”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学家, (3): 118-128.
- Li X X, Song W H. 2026.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whole-industry chain and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agricultural whole-industry chai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policy [J]. Economist, (3): 118-128. (in Chinese)
- 李祖佩. 2023. 项目下乡与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优化——以“嵌入的自主性”为视角[J]. 政治学研究, (6): 202-213.
- Li Z P. 2023. Projects entering the village and optimiz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 autonomy”[J].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 202-213. (in Chinese)
- 李祖佩, 钟涨宝. 2020. “经营村庄”: 项目进村背景下的乡镇政府行为研究[J]. 政治学研究, (3): 39-50.
- Li Z P, Zhong Z B. 2020. Managing villages: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in the context of project entering into villages[J].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 39-50. (in Chinese)
- 梁琦. 2023. “新经营村庄”: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项目经营的治理逻辑[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3(2): 33-44.
- Liang Q. 2023. “New village management”: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village project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3(2): 33-44. (in Chinese)
- 梁伟. 2022. 农业转型的社区实践与驱动逻辑——基于湘中鹊山村的经验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11): 2-20.

- Liang W. 2022. Community practice and driving logic of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in Queshan Village in central Hu'nan[J]. Chinese Rural Economy, (11): 2-20. (in Chinese)
- 刘梦玲. 2025. “项目制”下的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四川乡村调研报告[R]. 北京:中金研究院.
- Liu M L. 2025.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under the “project system”: a research report on rural Sichuan [R]. Beijing: CICC Research Institute. (in Chinese)
- 刘珊, 吴理财. 2025. 从外部赋能到自主激活: 项目进村推动村庄内生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协同路径——基于湖南省 G 村的考察[J]. 理论月刊, (10): 114-124.
- Liu S, Wu L C. 2025. From external empowerment to autonomous activation: the logical approach and collaborative path to project-based endogenous villag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G in Hunan Province[J]. Theory Monthly, (10): 114-124. (in Chinese)
- 刘述良, 吴少龙. 2023. 县域项目制治理: 理念与机制[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1(9): 126-136.
- Liu S L, Wu S L. 2023. Governing by project system in county level: ideas and mechanisms[J]. Journal of SJTU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1(9): 126-136. (in Chinese)
- 刘璇, 秦婉聪. 2023.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发展机理与路径研究[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17(5): 30-36.
- Liu X, Qin W C. 2023.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western China [J]. Journal of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17(5): 30-36. (in Chinese)
- 刘岩, 任大鹏. 2023. 转型期扶贫车间产业存续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与困境反思[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3(2): 61-71.
- Liu Y, Ren D P. 2023. Reflection on the internal logic,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dilemma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hop industr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3(2): 61-71. (in Chinese)
- 毛春梅, 姚清. 2025. 地方政府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差序嵌入与治理赋权——基于霍山石斛产业的历时性观察[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5(1): 92-103.
- Mao C M, Yao Q. 2025. Differential embedment and governance empower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to promote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of the Houshan Dendrobium industry[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5(1): 92-103. (in Chinese)
- 孟捷. 2023.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J]. 经济导刊, (4): 15-18.
- Meng J. 2023.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J]. Economic Herald, (4): 15-18. (in Chinese)
- 秦振兴, 王远. 2025. “项目进村”的实践类型与治理效果差异——基于双重嵌入性视角的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4): 149-158.
- Qin Z X, Wang Y. 2025. Project types and governance effects in villages: a dual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J].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4): 149-158. (in Chinese)
- 邱蓉. 2021. 乡村振兴视角下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同构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4): 137-145.
- Qiu R. 2021.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the west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4): 137-145. (in Chinese)
- 寿金杰, 陈文烈. 2026. 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民族地区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新质生产力赋能视角[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6(1): 12-20.
- Shou J J, Chen W L. 2026.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nd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in ethnic regions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an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based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26(1): 12-20. (in Chinese)
- 王凤彬, 张雪. 2022. 用纵向案例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过程研究范式、过程理论化与中西对话前景[J]. 管理世界, 38(6): 191-212.
- Wang F B, Zhang X. 2022.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with longitudinal case studies: process study paradigm, process theorization and the prospects of Sino-western dialogu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8(6): 191-212. (in Chinese)
- 魏后凯. 2023.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J]. 中国农村经济, (7): 2-19.
- Wei H K. 2023.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7): 2-19. (in Chinese)
- 吴忠市红寺堡区史志编纂领导小组. 2020. 2020 红寺堡年鉴[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The Leading Group for Compilation of the Annals of Hongsibu District, Wuzhong City. 2020. Hongsibu yearbook 2020 [M]. Yinchuan: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西奥多·舒尔茨. 2006.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Schultz T W. 2006.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 Liang X M,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trans. into Chinese)
- 西蒙·库兹涅茨. 1985. 各国的经济增长: 总产值和生产结构[M]. 常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Kuznets S. 1985.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M]. Chang X,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trans. into Chinese)
- 薛正昌. 2019. 红寺堡移民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Xue Z C. 2019.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 in Hongsibu[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杨虎涛. 2008. 马克思经济学时间观与演化经济学时间观之比较[J]. 学习与实践, (2): 32-37.
- Yang H T. 2008. A comparison of Marx's economic view of time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view of time[J]. Study and Practice, (2): 32-37. (in Chinese)
- 叶嘉国. 2020. 广东欠发达地区“滞后型发展”的主因和对策探究[J]. 广东经济, (11): 14-25.
- Ye J G. 2020. Exploration of the main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Guangdong [J]. Guangdong Economy, (11): 14-25. (in Chinese)
- 约拉姆·巴泽尔. 2006. 国家理论: 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M]. 钱勇, 曾咏梅, 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Barzel Y. 2006. A theory of the state: economic rights, legal rights, and the scope of the state[M]. Qian Y, Zeng Y M,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trans. into Chinese)
- 张国宝. 2023. 光辉历程: 中国发展改革 40 年亲历与思考[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Zhang G B. 2023. A glorious journey: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s on 40 years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reform[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张绘. 2022. 实现西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J]. 人民论坛, (23):

- 50-53.
- Zhang H. 2022.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western China[J]. People's Tribune, (23): 50-53. (in Chinese)
- 张良. 2023. 项目制如何形塑农村基层治理[J]. 浙江社会科学, (5): 82-91, 113.
- Zhang L. 2023. How project system shapes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5): 82-91, 113. (in Chinese)
- 张林, 温涛, 刘渊博. 2020.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 理论机理与实证判定[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6(5): 42-56.
- Zhang L, Wen T, Liu Y B. 2020.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determination[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6(5): 42-56. (in Chinese)
- 张培刚. 2013. 农业与工业化[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Zhang P G. 2013.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周佩萱. 2024. 动员、合作与整合: 村庄产业发展能力提升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裕村苍术产业发展为例[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 73-80.
- Zhou P X. 2024. Mobilization,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improving villag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bility—a case study of atractylodes industry in Yu Village, Shaanxi Province[J]. Journal of Shandong Academy of Governance, (2): 73-80. (in Chinese)
- Chamlee E. 1993. Indigenous Africa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Cato Journal, 13(Spring/Summer): 79-99.
- Fei J C H, Ranis G. 1964.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M]. Homewood, Ill.: R. D. Irwin.
- Guillaumont P. 2000. On the economic vulnerability of low income countries[R]. Working Paper from CERDI No. 200016.
- Kuznets S. 1963.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agriculture: notes on measuremen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2): 139-191.
- Lynch K. 2005. Rural-urban interac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M]. London: Routledge.
- McGee T G. 1991.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 expanding a

- hypothesis [M]//Ginsburg N, Koppel B, McGee T G.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umford L. 2005. The city in history: a powerfully incisive and influential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form through the ages[M]. Song J S, Ni W Y, tran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 Nenonen S, Storbacka K. 2021. Market-shaping: navigating multip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J]. *AMS Review*, 11(3/4): 336-353.
- Tacoli C. 1998a. Rural-urban linkages and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M]//Carney D.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What Contribution Can We Make?. London: DFID:67-82.
- Tacoli C. 1998b. Rural-urban interactions: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J].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10(1): 147-166.
- Tacoli C. 2004. Rural-urban linkages and pro-poor agricultural growth: an overview [R]. OECD DAC POVNET Agriculture and Pro-poor Growth Task Team. Helsinki Workshop. Paris: OECD.
- Todaro M P. 1981.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M]. New York: The Book Press.
- Tsakok I, Gardner B. 2007.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mary engine of growth or chicken and egg?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9(5): 1145-1151.

Government Guidanc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 Study of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Farmer Collaborative Model” in Hongchuan Village, Ningxia

LI Xiaoyun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Committee (Ningxia Academy of Governance),
Yinchuan, Ningxia, China)

Abstract: Taking Hongchuan Village in Hongsibu District of Ningxia as the research cas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exploration of a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localized development path with western characteristic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s, difficulties

i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underdeveloped market conditions. Relying on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guidance, project-driven integration, enterprise operational empowerment, farmer participation and benefit sharing, the village has blazed a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path. The study find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layed a pivotal bridging and catalytic role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y accurately identifying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s, scientifically defining and fostering leading industries, coordinating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targe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entitie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established an institutionalized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featuring 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risk sharing and benefit sharing among the government, market players and village collectives. This has realized a virtuous cycle of village collective income growth, resident employment expansion and industrial advancement. This practice has not only formed a government-enterprise-farmer collaborative model that integrates exogenous guidance and endogenous activation but also facilitated the vertical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and spati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of Hongchuan Village. The model also embodies th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 of overall planning-oriented industrial operation.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role positioning, market embedding and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offers reference implications for similar regions to adv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leveragi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Keywords: Hongchuan Village; industrial planning; facility agriculture; ecological migration; integration